

埃以“消耗战”(1967-1970)下的美苏对话

张莹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埃及与以色列的“消耗战”历时三年之久。美国与苏联为了各自的全球战略,不仅积极展开对话,还向交战双方输入了大量的新式武器,这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向。特别是苏联,直接参与了埃及与以色列的空战。同时,“消耗战”也对美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消耗战;埃以关系;美苏会谈;影响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1)01-0125-05

A Dialogue between U. S. A. and U. S. S. R. in the War of Attrition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ZHANG Y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China)

Abstract: The War of Attrition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lasted for three years. For the sake of their global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ot only actively carried on a dialogue, but also aided a mass of new weapons to both sides at war, which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the war. In particular, the Soviet Unio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aerial warfare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Meanwhile, the “War of Attrition”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The War of Attr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US-Soviet talks; influence

“六日战争”^①的结束不仅没有意味着埃以硝烟的熄灭,反而预示着一场大的战争的开始。以色列取得了“五千年犹太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胜利”,^{[1](p213)}发誓不再犯第二次中东战争的错误——在没有得到永久和平的承诺下撤出被占领土。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则进一步加深,但是基于自身实力在“六日战争”中的损伤,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自“六日战争”后,埃及以小规模炮火不断骚扰苏伊士运河东岸,埃以“消耗战”^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由于它前承“六日战争”,后

① 指1967年6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因历时六天,故称“六日战争”,也因其爆发于6月5日,又名“六五战争”。

② “消耗战”的说法,是由纳赛尔提出,而以以色列方面则称之为第四次中东战争,参见Nadav Safran, ISRAEL: The embattled ally,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47。之所以称之为“消耗战”,是因为埃及鉴于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后,其供应补给线拉长,所以予以炮战频繁袭击苏伊士运河东岸,消耗以色列的人力、物力、财力,直至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而以以色列方面则要避免陷入消耗战的作战方式中,以求速战速决。

收稿日期:2010-10-29

作者简介:张莹(1984-),女,山西长治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启“十月战争”,^①长期以来对它关注很少,^②本文就从“消耗战”的历史过程谈起,探讨美苏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对各自的影响。

一、埃及“消耗战”的历史回顾

(一) 埃及备战阶段: 1967 年 7 月至 1969 年 2 月

1967 年 7 月 1 日,埃及在停战 20 天后第一次交火,自此以后双方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 10 月底,埃及击沉了以色列的“埃特拉号”驱逐舰,以色列为了报复轰炸了苏伊士城的炼油厂。不过,由于在“六日战争”中的损耗过大,埃及并没有发动较大规模的攻击,其首要目标在于恢复军备、重组军队。

7 月末,埃及从苏联购得约 110 架作战飞机、200~250 辆坦克。10 月,埃及的飞机数量已达战前水平,坦克也增至 700 辆。^{[2] (p165)} 1968 年春,埃及已装备了比战前更先进的飞机、坦克、火炮,恢复了军事力量,并把其中的 3/4 共 7 个师 10 万人的兵力部署在苏伊士运河西岸。^{[2] (p167)} 至此,埃及军队的休养生息工作基本完成。9 月起,埃及向苏伊士运河沿岸派出由大约 15000 人^{[3] (p199)} 组成的部队,相应的武器装备也运往沿岸地区,准备随时向苏伊士运河东岸进攻。

(二) 埃及主导阶段: 1969 年 3 月至 7 月

1969 年 3 月,埃及公开抛弃联合国第 242 号决议,其炮兵不断向运河东岸开火。“消耗战”正式爆发。以军损失惨重,据以官方数字,以军伤亡人数从 5 月的 51 人(其中 13 人死亡)增加到 6 月的 89 人(有 17 人死亡),7 月更是达到了 112 人(有 31 人死亡)。^{[4] (p64)}

(三) 双方相持阶段: 1969 年 7 月至 1970 年 1 月

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以色列开始运用其空中优势轰炸运河周围,此外海军也参与作战,战争扩大。从这时开始直到 11 个月后停火的达成,以军一直对运河西岸进行有组织有规律的空炸。9 月,在两次较大的冲突中,埃及损失惨重,以色列仅被埃及的反导弹火力击落一架飞机。^{[5] (p136)} 此外,美国答应供给以色列的鬼怪式战斗机,第一批有 4 架于 9 月 5 日抵达以夏琐空军基地,这对于以色列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1] (p171)} 10 月以军改变空军攻击方向,从运河地带深入到苏伊士湾,进而纵深攻到埃及本土境内。战争进一步扩大。

(四) 以色列主导阶段: 1970 年 1 月至 4 月

1970 年 1 月 6 日,以色列国防和安全内阁部长会议批准通过了之前纵深系统轰炸埃及境内的提议。次日,以军轰炸了苏伊士南北沿岸的军事目标和运河东南部三角洲的军事基地达 1400 个小时之久。^{[1] (p176)} 1970 年 1 月初,第二批鬼怪式战斗机(16 架)到达以色列,^{[1] (p177)} 以军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对埃及轰炸。

埃及无力招架以色列以空炸为主的还击,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苏联的武器支持。1 月 22 日,纳赛

① 指 1973 年 10 月 6 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因其发生在十月,又是阿拉伯人的斋月,故称“十月战争”或“斋月战争”,又因其开战之日为犹太教的赎罪日,故称“赎罪日战争”。

② 最早对“消耗战”有所探究的应该是穆罕穆德·哈桑宁·海卡尔分别于 1969 年 3 月 27 日、4 月 11 日和 4 月 25 日发表于埃及金字塔报(Al-Ahram)的报道,题目是《消耗战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The Attrition”),它从埃及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出发,对比了埃及与以色列的优劣势,说明了埃及采用消耗战这一战略具有可行性,并且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不过,由于“消耗战”处在“六日战争”和“十月战争”之间,所以此后相关研究成果不是很多。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仅国外有两本比较全面研究此次战争的专著,分别是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雅科夫·巴思曼托夫(Yaacov Bar-Si-man-Tov)于 1980 年出版的《1969 年至 1970 年的消耗战:有限地区战争的研究范例》(“The Israeli-Egyptian War of Attrition, 1969-1970: A Case-Study of Limited Local War”)和前美国外交官大卫·科恩(David A. Korn)于 1992 年出版的《1967-1970 年间的埃及消耗战与中东大国外交》(“The War of Attrition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1967-1970”)。学术论文方面,国内还没人涉猎过这一领域。国外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主要有艾哈迈德·哈利迪(Ahmed S. Khalidi)1973 年发表于《巴勒斯坦研究杂志》(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秋季号的《消耗战》(“The War of Attrition”)、艾维·希莱姆(Avi Shlaim)与雷蒙德·坦特(Raymond Tanter)于 1978 年 7 月发表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Raymond Tanter)合写的《1970 年以色列纵深轰炸埃及境内这一决策的选择、确定和后果》(“Decision Process, Choice, and Consequences: Israel's Deep-Penetration Bombing in Egypt, 1970”)。

尔秘密访问莫斯科,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寻求苏联更大力度的军事援助,特别是萨姆-Ⅲ型地对空导弹。

(五) 苏联直接参与阶段:1970年4月至7月底

从4月开始,苏联开始直接参与埃以的冲突。18日,苏联飞行员驾驶埃及飞机追击以机,开始代替埃及飞行员执行对以的作战计划。^{[1][p225]}以色列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损失了5架战斗机和3名飞行员,这是以空军自建立23年来未曾有过的失败。梅厄政府的执政能力受到质疑和动摇,内阁也陷入对战争前景的担忧之中。1970年7月底,在美苏的干预下,埃以最终达成停火。至此,埃以消耗战宣告结束。

二、美苏两国的态度及对话

消耗战不是简单的从战争到外交谈判再重新开战,然后又通过外交努力达成停火的过程。消耗战本身的战略意图是通过战争消耗的压力,寻求外交帮助,使各方通过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可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以色列从所占领土无条件撤军。^{[6][p50]}这一战略的实现有赖于大国的支持与承诺。除了苏联的无限支持外,美国的态度尤为重要。面对埃及咄咄逼人的战争姿态,美国给予以色列很大支持。

1968年1月,约翰逊宣布取消对以的武器禁运。不仅如此,在埃及公开违背联合国第242号决议开战后,美国国会在1969年10月通过了美国公民有权享有美以双重国籍的草案,这就表示美国允许其公民在以色列国防军内服役,这是对以色列军队人员紧张的极大支援。

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第46届总统,其上任初始就表明并不担心另一场埃以战争,或美苏在中东的对抗,其真正担心的是中东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有利于苏联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7][p145]}除了进一步稳定美以军事联盟关系外,他还希望能够和埃及进行直接谈判,并缓和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苏联方面,自从1967年埃及战败后,它就试图扮演阿拉伯唯一的朋友和其利益维护者。1967年9月,苏联给美国一份中东和平计划。12月,他们又提出了第二份计划,其表明了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施压的态度。此外,苏联提议美苏就中东事务进行会谈,其全权代表埃及和美国或以色列进行磋商。

1969年3月,美苏开始针对中东局势进行接触。一个月后,美、苏、英、法召开四国会谈,^①会谈之初就明确其目标是帮助埃以冲突双方达成政治和解,美苏一致表达了对其解决冲突前景的信心。不久,尼克松进一步表示美国愿同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10][p145]}5月26日,美国向苏联提交了一份解决埃以冲突的计划书,该计划被认为反映了美苏就中东某些问题已经达成妥协。^{[9][p433]}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随后访问开罗,向纳赛尔说明这份计划的细节并就该计划达成埃苏立场的一致。^{[10][p86]}

不过,埃及表示反对这项计划。“消耗战”暂时的胜利使他们对实现更加有利的政治解决方案充满信心,即一个更好的政治解决方案并不意味着仅仅埃以双方签订契约或达成交易,而是要坚持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赞成和参与。但是埃苏双方都同意仍然和美国进行谈判,其意图在于继续为实现在联合国242号决议基础上的政治解决方案而努力战斗。^{[12][p73-74]}另一方面,以色列也表达了对四方会谈和美苏会谈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拉宾十分担心美国迫于与苏联的缓和转而支持阿拉伯国家。梅厄夫人还扬言即使会谈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不会接受。9月底,苏联向美国作出重大让步:代表埃及同意接受1949年希腊罗德岛会谈模式。作为回应,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于10月28日会见多勃雷宁,向他提出了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十点计划。这份计划呼吁以色列从二战后埃及和英国委托地巴勒斯坦之间的边境线全面撤军,建议仿照1949年在罗德岛的先例,在雅林的主持下双方拟定协议等等。^{[10][p89-90]}同时要求苏联对这项计划给予肯定并促使埃及方面派出代表进行谈判。^{[1][p158]}多勃雷宁反应冷淡,会谈不了了之。这也是消耗战时期美苏就中东问题的最后一轮定期正式谈判。至于美国的这项计划,埃以双方均表示拒绝。

^① 这个会谈模式首先是由戴高乐与约翰逊在位时提出来的,后经勃列日涅夫提议,尼克松答应(其中有欲与法国缓解关系的原因)。美、苏、英、法四国会谈于1969年4月3日在伦敦召开,美苏之间的会谈也随之在华盛顿展开。真正主宰中东和平会谈的就是美苏会谈。

纳赛尔表示,“试图达成和平协议根本是在浪费精力,除了武力(中东)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出路”,法齐称这项新的计划“比之前的方案更加糟糕”,海卡尔称美国的这份方案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机遇而是一个“陷阱”。^{[1](p159)} 11月18日,埃及国民大会全票否决了美国的和平提议。^{[5](p38)} 以色列方面比埃及更加期待美国国务院的这项计划没有引起美国白宫的重视。实际上,会谈之后,美国仅仅是把该计划书的复印件交给了拉宾,并没有正式发表声明让以色列接受这项计划。尽管如此,以色列还是爆发了抗议浪潮,指责这项计划是强加给以方的,是美国在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之下对以方的背弃。同时,苏联也继续发动宣传制造对美国不利的消息。在他们向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宣传中,把谈判的止步不前全部归咎于美国。他们宣称美国支持以色列拒绝撤兵。这使美国在中东的外交陷入了多重阻碍之中。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美苏之间有关解决越南问题、限制性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和中国问题等等的战略意义显然凌驾于中东问题之上,所以不管是急于全面控制中东局势的苏联还是意图遏制苏联在中东势力发展的美国,他们的外交活动都是不太积极的。在此环境中进行的会谈,无论是四国会谈还是有主导意义的美苏会谈显然都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结果。会谈就像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运河沿岸加剧的战火暗示着一场新战争爆发的可能,会谈的结果有可能将会对未来军事行动产生影响。

三、消耗战对美苏的影响

中东地区位于东半球的中心区域,是“三洲五海”和“四峡四湾一河”之地,便利的交通,优越的位置和丰厚的资源使得它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国家的成立和美苏势力在冷战背景下迅速的渗透,使原有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每一次内部冲突都会引起利益相关的大国的介入,而介入的后果必然会对大国本身以及大国之间关系产生不小的影响。消耗战也不例外。

从历史上看,不管中东的局势受谁的控制,俄国或苏联都是中东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学者 R·D 麦克劳林说“苏联是个中东大国,而美国则不是,这是地理上的事实。苏联的边界线非常接近地中海,苏联的黑海海岸很容易受到来自地中海的海上袭击,从地理位置上说,巴库油田比开罗更接近于伊拉克和波斯湾的油田,至于伊朗的油田就更近了;而且,开罗与苏联领土的距离比它与苏丹的首都、沙特、两个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林或者伊朗的首都都更近,至于利比亚或者马格里布的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8](p341-342)} 这也是苏联为何自埃及民族民主革命后,一直拉拢埃及的原因。起初,纳赛尔秉持着不结盟运动的原则,保持与苏联的距离。然而随着阿斯旺大坝的建立,“六日战争”的失败,特别是消耗战中的极大损耗,埃及不得不一步步求助于苏联,并名副其实地成为苏联在中东的代理人。

军事上,战前苏联专家仅有 500 人左右在埃及,并且只负责复杂精密设备。但随着战争的爆发,至少有 1500 名专家来到埃及,他们接管了军队的训练和安排,从零散的旅部甚至到大块的整支部队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11](p50)} 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和指挥机构,实际上就是一个与埃及总参谋部平行的司令部。苏军顾问被派到埃及的营一级,甚至是连一级单位,没有征得苏联顾问的同意,一切重要的作战命令都不能生效。甚至埃及在使用米格飞机作战时,也必须事前得到苏联人的同意。

经济上,苏联通过加大援助,垄断对埃及的贷款、贸易,进一步控制了埃及人的经济生活。60 年代末,特别是“六日战争”后,苏埃贸易急剧增长,埃及成为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对象,苏埃贸易额占苏联对中东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13](p202)} 政治上,苏联在埃及的公会、青年和学生组织中建立它的影响,并且在埃及执政党——阿拉伯社会联盟内部扶持亲苏势力。苏共还派出了理论家和党的工作者帮助建立社盟的各级党校,培训埃及党政干部,吸收为数不少的社盟干部到苏共党校学习,在埃及政界培植了一批亲苏分子。

不仅如此,对苏联最具战略意义的是,1968 年末,埃苏签订了一个长达 5 年的秘密协议,允许苏联舰队在埃驻扎。此外,苏海军取得了亚力山大港、塞得港和马特鲁港等军港的使用权,其地中海特遣舰队基地司令部设在亚力山大港,可以在港内自由航行。苏空军控制了埃及多处空中基地,其中开罗西部和阿斯旺附近的两个基地,还驻扎了苏联的空军中队,至 1972 年萨达特驱逐苏联军事专家时,四年里埃及在开罗西部的空中基地中拥有了一支 TU-16s 空军中队。从那里起飞的苏联飞机可以监视地中海

的美军第六舰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舰队的活动。自此,苏联军事力量延伸到非洲北部和欧洲南部。

比较而言,同一时期美国在中东的活动没有苏联积极,可谓苏联是“一动”,美国是“一静”。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泥沼,尼克松上台后急于打开越南僵局;另一方面以色列日益强大,只要以色列的实力没有受到实质上的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就不会有所损失。然而,美国正是在这“一静”中探明了苏联的中东战略并确定了自身中东政策的核心。1970年3月,西斯科递交给尼克松一份备忘录,总结了数月以来他与苏联人谈判的结果:苏联不打算实现中东任何形式上的协议,而计划将中东维持在一种可控制的紧张状态中,这比实现中东和平更有利于苏联利益的获得;美国应该利用这一点指导自己的中东外交政策,排除苏联的外交影响,与埃及直接会谈。尼克松十分同意备忘录中的内容,说“乔,这就是我们将要走的路。”^[1] (p149,164)

此外,消耗战的爆发以及解决过程再一次激化了原本存在于尼克松政策机构(罗杰斯与基辛格)以及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以罗杰斯为首的国务院认为:要想解决中东问题,美国必须向以色列施压、与阿拉伯国家缓和,通过谈判来实现阿以和平的目标,由此削弱苏联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美国这一时期的中东政策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原则实施的,罗杰斯计划的出台正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然而,随着尼克松和基辛格美苏大战略的形成,“连环套原则”的广泛应用,罗杰斯的中东政策日益被基辛格指责为会影响美国对苏联的整体战略。^[14] (p17) 就连尼克松本人都对罗杰斯计划嗤之以鼻,“我知道罗杰斯计划永远实现不了,然而我认为有必要让阿拉伯世界知道,美国并非有意不去考虑被占领土的问题,也决不排除有可能就双方争执不下的要求达成一项折衷的解决方法”。^[8] (p147)

最后,虽然罗杰斯计划没有实现中东真正的和平,但是对美国左右中东局势意义深远的是:埃及双方最后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即使墨迹未干埃及就违反了停火协议,协议本身也确立了美国成为阿以双方都承认的公正中间人的地位。这是美国这一时期外交活动最大的收获。

(注:本文是在我的导师孙君健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

参考文献:

- [1] David A. Korn. The War of Attrition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1967 - 1970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 [2] [日] 田上四郎. 中东战争全史 [M].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 [3] Chaim Herzog. The Arab - Israeli Wars: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M]. BIRMINGHAM: Book Club Associates, 1982.
- [4] Ahmed S. Khalidi. The War of Attrition [J].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73, Vol. 3, No. 1.
- [5] Daniel Dishon (ed.). Middle East Record Volume Five 1969 - 1970 [M]. JERUSALE: Israel Universities Press, 1977.
- [6] Yaacov Bar - Si - man - Tov. The Israeli - Egyptian War of Attrition, 1969 - 1970: A Case - Study of Limited Local Wa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7] [美]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 上册 [M]. 伍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8] [美]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 中册 [M]. 裘克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9] Safran. Israel - Embattled Ally [M].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0] William B. Quandt. Decade of Decision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1967 - 1976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11] Alvin Z. Rubinstein. Red Star on the Nile: The Soviet - Egyptian Relationship Since the June War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2] Lawrence L. Whetten. The Canal War: Four Powers Conflict in Middle East [M]. MASS: MIT Press, 1974.
- [13] 刘 竟. 苏联中东关系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14] Derick L. Hulme. Palestinian Terrorism and U. S. Foreign Policy, 1969 - 1977: Dynamics of Response [M].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责任编辑: 戴利朝)